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成功的原因

郭 祥

(安庆师范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 农民生活是内向型的, 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农民奉行的是一种“极小极大”的战略, 只有重视农村调查, 针对农民和乡土社会的特点, 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使农民投身到变革中来。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实践为我们今天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 内向型; “极小极大”; 农村调查

中图分类号: D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70(2009)01-0051-04

收稿日期: 2008-09-08

作者简介: 郭祥(1980-), 男, 河南浚县人, 安庆师范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乡土中国研究。

“农村包围城市”的星星之火为什么发展为燎原之势, 历来都是党史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 只有首先认识了农民与乡土社会的特点, 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成功的原因。同样, 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的层面挖掘出好的经验以资当今的新农村建设。

一、农民与乡土社会

著名农民学专家秦晖说, 农民是“人身依附状态下的臣民”^{[1](p16)}。考察历史, 农民总是处在社会的从属地位。在农民之上的无论是地主, 还是集权国家的官员, 都控制着农民生活的基本资源, 他们都使农民趋向内向型的生活。地主们利用自己的权势或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土地来限制农民与外界人的接触, 并力图保持农民的内向型生活模式; 而与此同时, 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对农民的横征暴敛, 致使农民走向封闭, 尽可能减少对外界的依赖, 只是在家庭或地区内部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此外, 农民对市场参与也缺乏热情与安全感。这些与市场各组成要素的矛盾与不衔接、有权势者对市场的垄断有关, 比如地租由实物向金银的转变使农民不得不忍受商人的剥削和白居易《卖炭翁》中皇宫的强取豪夺。不充分的市场制度意味着没有能使农民与其他阶级建立起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交换媒介, 致使农民缺乏建立政治性联盟的基础, 最终

使农民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熟人共同体”中, 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无权地位。他们的分散性导致他们数量的庞大却整体的弱势。因此, 他们奉行的是一种“极小极大”的战略, 即冒最小的风险争取最大的对环境的控制, 正如费孝通所说, “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 是一个安稳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农民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 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 人不过是去接受它, 安于其位, 而不能去改变它;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 那就是改变自己去适合于外在的秩序”。^{[2](p47)} 因此, 依靠农民自身开展变革, 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发动解放他们的革命, 也需要来自农民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不可, 如中国共产党。而即使温和的改良, 农民也是需要外力的推动, 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即便中国近年来的“村级民主”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具有国家民主理念的外部精英推动的。只有在“不反亦死, 反亦死”的情况下, 农民才会揭竿而起。

农民的内向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度自给自足的家庭主义、家庭经济和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水平以及相对封闭的等级制度。而在这种生活模式和经济状况下, 农民唯一值得信赖的是土地。土地不但是他们的生存保障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土地分配不公, 又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通病。这一现象可以说已经使农民养成了“土地拜物教”的心理,

这种心理已经超出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实际需求。纵观中国任何农民起义如果不提出土地改革来吸引贫困的农民,是很难取得成功和有所作为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要使农民参加革命需要以下五个因素:首先,一定要有农民的经济危机而导致农民生活不下去;其次,现政府又无法、甚至无视农民的生活,使农民对政府、现行秩序充满仇恨和不满。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不能为农民提供适合于农民新经济地位的大的政治社会的法律制度;秦晖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是因官民矛盾而非租佃矛盾的激化所致。一些土地集中、租佃率高的地区历史上是有所谓的‘佃变’、抗租等现象,但那都是社区内冲突或地方性冲突,由主佃冲突发展为官民冲突已很少见,由‘佃变’蔓延发展为‘农民战争’的事更从未有过。历代的‘农民战争’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制裁(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或由于吏治腐败而激成民变。”^{[1](p45)}也就是说,农民矛头所向是现存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地主。

“毛在 1933年至 1934年鼓吹的‘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指肉体上统统消灭这些地主分子。全部剥夺地主的财产,摧毁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基础;动员农民群众同他们作斗争,目的在于摧毁地主传统上和习惯上所拥有地位的根子。”^{[3](p140)}

其三,农民也是有理性的,他们是否参加变革,取决于他们对参与变革的直接利益和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与代价孰轻孰重的权衡,对农民来说,如果你能给他土地并能保证不使其“得而复失”,那么你就找到了使农民动起来的“发动机”,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其四,革命领导人和吸收农民加入革命来扩大革命力量的革命组织的出现,像中国近代的孙中山毛泽东、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其五,关键的因素是该革命地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农民摆脱国家力量的镇压和打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规模很小和革命很脆弱的时期,这一因素尤其重要。在革命力量初期以及虽有所发展但相对反动势力仍显得弱小时,农民群众对革命是有担心的,他们害怕斗争失败及失败后反动势力的报复,所以,毛泽东说:“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

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4](p69)}

二、“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能够成功

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那个时代给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

第一,中国革命高潮必然到来和“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由之路。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和压迫其他阶级的暴力机器。历史上任何腐朽阶级的统治,也都是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将其推翻的。而且,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到来。“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决定。”^{[4](p100)}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因它们加紧争夺中国发展了;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造成中国各派的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而这必然导致赋税的加重,必然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此外,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4](p101-102)}但毛泽东认为,

中国革命不能像苏联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占领乡村,而是要先占领农村而后占领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根据以下情势的判断:第一,城市中心对农民边缘控制的弱点。反动势力特别是其行政势力和军事力量盘踞都市,对农村无力或不屑控制。第二,共产党军事力量弱小,其可以利用有限的力量、趁敌人不备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但不足以在四面楚歌中长期占据都市。第三,无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是其他根据地都位于两省或多省交界地带,或是地理条件复杂地带,这有利于利用各省区间私人军事力量的矛盾和当地优越的地理条件。第四,这些地区较之其他地区无疑经济更为落后,农民生活更为贫困,并深受大革命的洗礼,革命积极性较高。

第二,南京政权是“油水”政权,无心无力无能改变农民生活

中华民国只是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各路军阀仍然存在,国民党控制的只是南京周围数省。南京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饥荒旱涝不断、苛捐杂税如毛,不但无心无力无能改变农民生活,而且还带来了“慈母不忍听儿啼,深夜活埋深雪中”、“关中饥寒,飞鸟坠地而亡”的惨剧。^{[5](p112)}南京政权若油,人民若水;油浮水上,油水分离。所以笔者称南京政权是“油水”政权。这种政权只能骑在人民头上,而不会融入到人民中去。

第三,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改革给农民土地

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6](p285)}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说:“……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7](p175)},“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7](p175)}。毛泽东明确的指出,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因此,毛泽东非常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土地改革是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内容,只有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壮大革命力量,造成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无疑,毛泽东进行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是争取和发动群众。1934年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4](p136)}而要完成这个中心任务,首要的是“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4](p136)}土地改革可以说是毛泽东动员农民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四,吸收农民入党和欢迎他们加入红军以壮大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发展党员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像其他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一味强调必须从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而是从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农民优秀分子入党,并鼓励和动员农民参加红军。在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而且基本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村工作为中心,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党,并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

此外,毛泽东非常注意组织农民和对他们进行政治训练。一方面,注意发展合作社和群众团体如工会、贫农团等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作用和权力,反对党不通过政府而直接下命令的方式,切实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这样,既克服了农民的分散性也提高了农民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

第五,党、政权和军队建设确保农民利益不得而复失。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到,“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和“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是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4](p57)}通过土地改革和动员农民,“很好的群众”无疑具备了,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也是毛泽东非常注重的。农民、党和军队可以说是红色政权的“三驾马车”,而政权建设反过来对保障农民利益、进行党的建设和开展军事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建设是在武装斗争的严酷环境中进行的,与党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紧密相联,武装斗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党的命运。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人民军队的关系,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是党的建设中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在农村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党员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红军大部分来自农民。而党和军队的不断壮大成为农民利益不“得而复失”的有力保障。

毛泽东就像一个射箭高手,时代给他提供了“靶子”,而他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给当今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首先,要重视调查研究。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

娩”。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和他对农村农民的调查分不开。正是“十月怀胎”长时间的调查,使“农村包围城市”一朝分娩。也可以这样理解,时代已经为“农村包围城市”提供了可能,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提出了这一革命道路?因为他的调查研究,使他敏锐意识到时代给中国革命创设了什么条件并知道了如何应用这些条件。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这些调查的理论成果,使毛泽东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行不通时,在别人看来是绝望时刻,毛泽东却根据自己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农村调查得出的结论,毅然决然的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4](p1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后,毛泽东继续重视调查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提出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都与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密不可分。

我们现今的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新农村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但如何利用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条件就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要调查农村现实,要因地制宜。要知道山区农村有山区农村的实际,平原农村有平原农村的实际;城郊农村有城郊农村的实际,偏远农村有偏远农村的实际。

其次,要发展好、维护好、保护好农民利益。

“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的成功就是一个例证,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满足了农民的利益。

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切实解决好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做好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发展高产、高效农业;加快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步伐,改善农村卫生和交通条件。一定要发展好、维护好、保护好农民利益。

最后,新农村建设是一部戏,农民是“主演”,政府是“导演”。

农民要“动”起来,当然需要外来的推动,但是推动决不是包办代替。“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4](p124)],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用每一个农民能够接受和喜欢的方式来动员他们。毛泽东正是相信农民之中蕴藏的能力,所以一直反对站在农民面前指手画脚,不做农民的先生,而做农民的学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是“主演”;而各级党委和政府是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是“导演”。新农村建设成败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农民利益是否得到保护、维护和发展。如果农民得不到实惠,它必然只能浮在农民之上,成为“油水”工程。

[参 考 文 献]

- [1] 秦晖. 农民中国: 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毛泽东 [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室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87.
- [4]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周伟. 世态万象——社会时尚万花筒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7] 费孝通. 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张孟杰]